

# 简论清末谴责小说的消亡

刘明坤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 清末谴责小说在讽刺社会、警醒世人方面曾经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人们认识腐朽黑暗的官场和晚清浇漓的世风也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存在的弊端和作家思想的局限,限制了它的继续发展,因此,晚清谴责小说在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暴露了它无法克服的弊端和自身存在的大量缺点。在晚清民初社会急剧动荡的转型时期,由于作家们不能跟上时代步伐转变创作思路和理念,也由于他们自己的阶级归属和价值取向之局限,使晚清谴责小说走向了消亡。

关键词: 谴责小说; 弊端; 局限; 消亡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08)01-0032-03

近代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人对腐败的清政府也不再有信心。同时,满清政府苟延残喘,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也越来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说界出现了大量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阴暗与丑恶的作品。这一类小说大都写得很尖锐,但由于作者迎合读者求一时之快的心理,描写往往言过其实,显得浮露而缺乏深度。鲁迅先生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掎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鲁迅认为这一类小说还不够格称作讽刺小说,就把它们别称为“谴责小说”。其代表作家有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等所写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通常合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我们所说的清末谴责小说主要以它们为代表。这些小说和其他同类小说一起,反映了清末政治普遍的腐败现象和社会大众对清政府的厌恶心理,并且通过小说本身思想倾向的变化,反映了清末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情况,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孽海花》作者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中曾云:“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30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

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时期内飞也似地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节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由是观之,作者试图在这部小说里容纳30年历史的本质内容,并表现出它的发展趋势。质而言之,就是要把《孽海花》写成一部历史小说。而所谓历史小说,已经不同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演义小说”;历史演义小说,即历史的通俗化;而这里所说的历史小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概念。其基本特征是:“把奇妙和真实”结合在一起,塑造“个人与社会历史命运更紧密结合的人物”,表现历史的本质和趋向,最终“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地位”。应该说,《孽海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堪称是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小说。阿英说:“……晚清小说的主人公,一般地说,不是那些赴汤蹈火的群众、英雄与爱国志士,而是贪污与媚外的是官僚与其爪牙,是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买办(汉奸),还有,就是一些市侩主义的人物,和洋场才子、臭文人之类的知识阶级。如《文明小史》等是。而当时进步的,如前期的维新派,后来的革命党,却被嘲笑了。至于群众不是主体,但有一特点,即与官府相反,写出他们的革命性。”关于此时小说的风格,鲁迅先生说:“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

收稿日期:2007-12-11

作者简介:刘明坤(1977-),山东泰山人,扬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元明清文学方向。

32

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鲁迅又说:“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所以,它的弊端决定了它的消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视它。

谴责小说存在着弊端,大致有:

第一, 谴责小说或多或少都有夸张失实的毛病,它所反映出的是一种变形的镜像,而并非故事的本来面目,不可完全当作历史的真实面目来看待;尽管这类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有原型作为依托,作者也常多年身处其中,但经常会因为作者自身性格或批判的需要,而进行无节制的放大,或片面地截取一面,这样的例子在《官场现形记》中不胜枚举。如《孽海花》循着作者的笔触,不难寻绎出30年间政治、文化的演变史,使小说具有了“历史哲学”的意味和境界。虽然,小说中不乏对清廷腐败的揭露和谴责,然而,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变迁史过程中的附带而已。因此,《孽海花》终究是一部“历史小说”。只有把握了它的这一本质特征,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就会深入一层。当然,历史小说并非历史教科书,即使它取材真实,人物亦历历可考(据考证,小说中人物有生活原型者达270余人),但是,绝不可把它与历史生活本身等量齐观。它毕竟是一部精心结撰的“奇妙与真实”结合的文学作品,它采用的夸张、变形手法是为讽刺主题服务的。如小说在庚子国变中,过于突出和强调一个妓女的作用,将政治与历史拉远,这种渲染反而使人怀疑其小说的记录历史的意义。还有关于中俄国界划分依据是一个公使划错了地图,而被俄人侵占土地,显然是作者采用的夸张变形来讽刺的。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作者的陈述就更有夸张意味了(尽管我们相信他的讽刺艺术和事件的部分真实性),作者说道:“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纪德君先生在《明清通俗小说创作中的浊流》一文中,对这种现象也进行了概括,纪先生认为:“有些谴责小说描写人物,讽刺世态,不讲分寸,不顾情理,褒贬失当,谩骂成习。欲著一人之恶,则酣畅淋漓,不留余地,一种卑鄙齷齪之态,虽鼠窃狗盗所不肯为者,而学士大夫转安之若素”。同样,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中,鲁迅先生就指出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

第二, 谴责小说大体上是顺应时俗的作品,它和现实政治、大众需求关系较紧密,而缺乏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深刻的思考,所达到的思想深度是有限的;真正能体现现象背后深刻的社会危机,以及系统地展示出根源的较少。并且,谴责小说缺少一根贯穿全文的主线,即使有一个人物贯穿始终,也是为了叙

述的需要,并非小说内在结构的安排,按鲁迅的说法是“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这些小说可以拆散为一个一个小故事。它们都尽量展示现实社会的广阔画面,在创作方法、题材方面大都相近。所以,这种结构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显著,大都是几百个人物,七、八十一个单篇故事,经过作者的筛选,归集而串联在一起。小说的思想观念也是封建主义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不够彻底,有些小说缺乏提炼,结构松散,人物与情节联系不够紧密,主题上以揭露社会阴暗面为主,在思想上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它的批判精神,对于抨击社会中普遍或特定存在的某些不良风气是极为需要的,也是小说家们对文以载道这一思想的传承。作家本身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使更多的人来关注那些丑陋的社会风气,以便施加外在的舆论压力,促使其达到收敛、改变的积极效果,即所谓“秉持公心,指摘时弊”。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而谴责小说很多地方借鉴《儒林外史》的手法,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达到劝世警世讽刺社会的目的。

第三, 谴责小说普遍注重故事性,大都没有正面形象作为小说主人公,即使有也是处于受排挤、被打击的地位,根本无法和邪恶势力抗衡并且缺乏对人物命运的关怀,因而在塑造人物形象、反映人性的复杂内涵这一小说艺术的关键上,没有取得特殊的成就,与明代小说及清中期小说相比,实际上是衰退的。谴责小说都以形形色色的人物描写,来突出不良风气打在人们身上的烙印。《官场现形记》集中揭露了官场的黑暗,书中不论是通过科举,还是捐纳出身的官僚,人人以“千里做官只为吃穿”作为“座右铭”,卖官购爵、贪赃枉法。从作品反映内容看,更体现出了这一主导思想。另外,晚清谴责小说的主人公,较少那些赴汤蹈火的群众、英雄与爱国志士,而是贪污与媚外的官僚及其爪牙,是帝国主义者及其奴才,是市侩主义者、洋场才人及酸臭文人之类的封建知识分子。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及曾朴的《孽海花》等作品中均有这类人物。作品内容都是以当时社会、官场、洋场为背景,揭示了当时腐朽的封建统治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特有的生活堕落与道德败坏,抨击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如刘鹗在《老残游记》中,着力描绘了玉贤、刚弼两个酷吏的事迹就是典型。再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不啻是一篇讨伐当时官场的檄文。”把官场卑污苟贱的丑恶本质,刻画得淋漓尽致。带有自传性质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以“九死一生”二十年耳闻目睹的无数怪现象,描绘了行将崩溃的清政府

的社会现实。作者笔下的大小官吏大都是肮脏龌龊、贪得无厌、卑鄙无耻的。其中有作贼的知县、盗银的臬台和让妻子为制台“按摩”的候补道等等官场丑类。

第四,谴责小说的作家大多是改良主义者,他们暴露封建专制制度,并不是为了推翻这个制度,而是为了挽救这个制度。如《老残游记》中比较精彩的一段比喻,道出了作者“补天”的思想。他把濒临崩溃的封建帝国比喻为一艘即将沉没的大船,而这船上所载的各色国人思想不齐,需要有人救助。“这船虽有二十三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那人便道:‘你们知道现在是非钱不行的世界了,你们大家敛几个钱来,我们舍出自己的精神,拼着几个人流血,替你们挣个万世安稳自由的基业,你们看好不好呢?’众人一齐拍掌称快”。此段写出了国家地位的危机与国人思想的落后,而作者的补救思想也是明显的,尽管这种思想遇见的压力与阻力很大,甚至象征国家与民族的小船正在倾覆,但作者的“救亡”意识却是坚定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作者批判的是道德的沦落与世风不古,作者并没有喊出推翻封建王朝与制度的口号,尽管作者也有深刻的焦虑意识。在小说最后,作者在历数这二十年的种种道德沦丧的怪现状后,也只是苍白的感叹,并没有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让人看到的只是束手无策和道德的无奈。作者在经历了种种现状后,给人的不是对封建伦理与道德认识上的醍醐灌顶,而是对这种垂死的制度心存忧虑,一半是希冀,一半是幻想,作者身上浓厚的“补天”思想显现了他们对这种制度的留恋及惋惜,这种思想在《老残游记》中同样得到体现,老残期盼能吏、廉吏,但最后他自己也采取了逃避与消隐的方式。这种思想的狭隘与局限是老残的也是作者刘鹗的,代表了谴责小说作者们思想的狭隘与落后。也注定了这些谴责小说价值的局限性。小说作者都是改良主义者,虽然反对当时的黑暗现实,但是他们仍在苦苦地维护当时的封建统治,并不想彻底打破这个现实世界,旨在通过“讽刺”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自觉进行改良,这是采用讽刺手法的最重要的原因。谴责小说的作者大部分是改良主义者,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虽然指摘做官的坏处,但只是为了叫做官的人知过必改。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虽然揭露了晚清社会的种种弊病,但他哀伤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沦亡,认为这些“怪现状”都是由

于“人心不古”所造成的。刘鹗的《老残游记》虽然揭露了玉贤、刚弼两个酷吏的暴政,写出了现实的黑暗,但他悲伤封建社会残败的局势,希望清政府“扶衰振敝”,挽救必然灭亡的命运。曾朴的《孽海花》虽然揭露了清政府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多处对光绪皇帝抱有很大幻想。总之,他们主张在不根本动摇封建制度的框子里做些社会改良。而且他们还污蔑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谴责小说作者情况看,他们多数是从爱国主义各种角度反对帝国主义和对封建统治者不满的社会下层知识分子。如李宝嘉、吴沃尧、刘鹗,其间也包括曾朴等少数政治活动家,他们都是从封建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基本思想是封建思想。由于政治上的保守,他们虽然对当时社会、对清政府的不满,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践踏,但他们也敌视民主主义革命,甚至连康梁的“维新变法”也认为是“过激”行为。晚清小说中表现出的反帝和反封建、反传统思想是不彻底的,小说作者们“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与统治阶级,一方面又反对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甚至在同一作者同一作品之中,同时并存着矛盾的认识”。就思想内容而言,晚清谴责小说既体现出了作者们反帝和反封建的思想,又有对革命的敌视,对当时进步的维新派和后期的革命党人,在作品中都作为被嘲笑的对象。

谴责小说的作家们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动荡不安的时代,看到了祖国疮痍满目、病人膏肓的危难,出于正直的品性与爱国心,全面痛揭了清末官僚机构的腐败,撕破了那些大大小小奴才们的道貌岸然的嘴脸,暴露了他们令人作呕的丑态,展示了我国封建社会即将崩溃的真实图景。这不仅满足了当时一部分人的情绪和要求,而且也激励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存在着的以上弊端也限制了它的发展,最终在清末走向了消亡。到了民初,大多作家又回归传统,一改谴责小说之风格,就是小说的另一种类型了。对于谴责小说的结局,鲁迅先生作结说:“此外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撰作此类小说者尚多,顾什九学步前数书,而甚不逮,徒作谯呵之文,转无感人之力,旋生旋灭,亦多不完。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

####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58.  
[2] 阿英.小说闲谈四种(之三):略谈晚清小说[M].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5.200.  
[3] 阿英.小说三谈[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98.

[责任编辑:蒋民胜]